

第一编

绪 论

第一章

近代汉语的历史范围

近代汉语是一门语言历史学科。研究这门学科理应确定或大致确定其历史范围，也就是说，应该弄清楚近代汉语的上下年限。这个问题在 80 年代以前未见专门讨论，有些学者在对整个汉语史分期时曾涉及此问题，如 20 世纪早期，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在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1915）^① 第一卷第一章中说：

我们可以说这个反切（指《广韵》的反切，引者注）是纪元五百年到六百年之间的一个语言。这个语言我们可以叫做中古汉语。这个时期以前的叫做上古汉语跟太古汉语。以后的叫做近古汉语——就是韵表的音；再往后就叫作老官话——就是《洪武正韵》的音。

稍后钱玄同《文字学音篇》（1918）把汉语语音的演变分为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及现代等 6 个时期。

以上是 20 世纪早期关于汉语史分期的两种观点，都是从研究汉语语音史的角度提出来的。

王力在 50 年代中期完成的《汉语史稿》第一章第六节《汉语史的分期》中提出将汉语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和现

该书共分四卷，陆续出版于 1915 年（第一卷）、1921 年（第二、三卷）、1926 年（第四卷）。此处引文据罗常培等译本，1940 年。

代 4 个阶段的意见：

一、公元三世纪以前（五胡乱华以前）为上古期。

（三、四世纪为过渡阶段）

二、公元四世纪到十二世纪（南宋前半期）为中古期。

（十二、十三世纪为过渡阶段）

三、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19 年五四运动为过渡阶段）

四、二十世纪（五四运动以后）为现代。

王力是从语音、语法、词汇 3 个方面综合考察，并“以语法作为主要的根据”（结合语音的演变），来给汉语史分期的。

他同时指出 4 个发展阶段各自的语言特点：

上古时期的特点是：1. 判断句一般不用系词；2. 在疑问句里，代词宾语放在动词前面；3. 入声有两类（其中一类到后代变了去声），等等。

中古时期的特点是：1. 在口语的判断句中系词成为必需的句子成分；2. 处置式的产生；3. 完整的“被”字式被动句的普遍应用；4. 形尾“了”、“着”的产生；5. 去声字的产生，等等。

近代汉语的特点是：1. 全浊声母在北方话里的消失；2. -m 尾韵在北方话里的消失；3. 入声在北方话里的消失，等等。

现代汉语的特点是：1. 适当地吸收西洋语法；2. 大量地增加复音词，等等。

对此 4 个阶段汉语的各自特点的概括，实际上是王力对汉语史分期的依据。王力的分期说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就是在每两期之间安排了一二百年的过渡阶段。因为他认为语言的发展是渐进的，由语言旧质到新质的过渡阶段可以历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

王力对于汉语史分期的意见和论证方法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海内外汉语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被一些学者接受或基本接受（如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1982；太田辰夫《汉语史通考》，1988）。

80 年代，吕叔湘结合近代汉语上下限问题，陆续地提出了他对汉语史分期的看法。首先，他认为汉语史分期在第一层面上应该是二分的：

有同样重要的一点也必须闹清楚的是，尽管我们说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我们却不认为把汉语史这样平分为三段是适当的。我们的看法是，现代汉语只是近代汉语的一个阶段，它的语法是近代汉语的语法，它的常用词汇是近代汉语的常用词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已。（《近代汉语读本·序》，1983）

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近代汉语指代词·自序》，1984）

关于近代汉语时段的起讫，吕叔湘认为：

我们发现，尽管从汉魏到隋唐都有夹杂一些口语成分的文字，但是用当时口语做基础，而或多或少地搀杂些文

言成分的作品是直到晚唐五代才开始出现的（如禅宗语录和敦煌俗文学作品），因此我们建议把近代汉语的开始定在晚唐五代即第九世纪。（《近代汉语读本·序》，1983）

这样，汉语的言文分歧（即实际口语和文献语言的分歧，引者注）就维持了很长一个时期，直到五四运动之后才重新统一起来。所以把五四时期定为现代汉语开始的时期是合理的。（同上）

吕叔湘对于汉语史的分期主要是从文献语言反映实际口语的情况来着眼的。1986年，吕叔湘为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一书写序中提出新的想法，他说：长时期的言文分离，给汉语史的分期造成一定的困难，因此，是不是可以设想，把汉语史分成三个部分：语音史、文言史、白话史，这样也许比较容易论述。文言由盛而衰，白话由微而显，二者在时间上有重叠，但是起讫不相同，分期自然也不能一致。

吕叔湘此种新想法似乎表明了他对以前的诸种汉语史分期的意见（他人的以及他本人的）并不尽满意。此种想法为分期问题，包括近代汉语时段起讫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吕叔湘的上述重要意见，也许是因为并非专文讨论，而是发表在几种书稿的序言之中，所以未见更多的具体论证。他关于近代汉语起于晚唐五代、止于五四运动的提法，与许多学者在工作实践中所形成的对于近代汉语的认识比较吻合。

80年代后半期，关于近代汉语的上下限的问题曾一度受到关注。1986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近代汉语学术讨论会上，不少与会学者曾就此问题进行商讨，胡明扬在会上宣读了他的专题论文《近代汉语的上下限和分期问题》（后收入

会议论文集《近代汉语研究》，1992），他认为，近代汉语的上限不晚于隋末唐初，下限不晚于《红楼梦》以前。《红楼梦》对话部分反映的口语应该是现代汉语。他提出的分期依据是：

1. 语音上阴阳入对应的严整格局开始动摇，入声韵尾 - p - t - k 从相混到消失；全浊声母的消失； - m 韵尾的消失。

2. 语法上“的”“了”“哩/呢”的出现和全面代替旧的助词系统；“这、那”代替“此、彼”；“将/把”字句的出现和发展；“动+将+趋”的出现、发展和消失。

3. 语汇中“我、你、他”（还有“们”）的出现和全面代替“吾、汝、其”等古汉语人称代词。

杨耐思、袁宾的意见，会后也写成专文发表。杨耐思认为，语音、词汇和语法三者发展不平衡，所以近代汉语的上限与下限不能“一刀切”。他同意吕叔湘的意见，近代汉语大致上是“晚唐五代到清代的一千余年”（《加强近代汉语研究》，1987）袁宾认为，近代汉语的历史范围，暂不宜采用划线切分规定上下限的方法。他认为，汉语历史阶段由主干部分和交替重叠部分组成，以南宋、元、明、清初为近代汉语主干，上下可推延几个世纪（《论近代汉语》，1987）

稍后，蒋冀骋在他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1991）中说：“本书上限采用吕叔湘先生晚唐五代说”，“近代汉语的下限本书以明末清初为界”。

杨建国《近代汉语引论》（1993）认为：“我们主张暂时将有唐一代整个包括在近代汉语之中。”

蒋绍愚在他的《近代汉语研究概况》（1994）中认为：“近

代汉语是从唐初到清初人们在口语和反映口语的书面语中使用的汉语。”

刘坚等《近代汉语虚词研究》（1992）指出：

目前对近代汉语历史年代划分问题的讨论还没有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但是大部分近代汉语研究工作者倾向于接受近代汉语的上限定在晚唐五代前后，下限定在清代前后的意见。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有待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随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对近代汉语的描述将会更加细致和充分，分期问题也将得到明确的答案。

这次关于近代汉语上下年限问题比较集中的讨论，前后历时 10 年左右，是 20 世纪内在整个近代汉语学科层面上的一次重要的专题学术争鸣。各家的论说提供了一些具有理论意义的思想方法，在他们的论著中，还列举了大量有证史价值、不可忽视的文献语言材料，共同形成了此课题研究的有益成果。这次由多位学者参与的讨论对于近代汉语学科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它使大家从理论上对近代汉语的历史范围有了大致接近的看法，有利于此后的研究、教学和文献整理等工作，也便于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者以及社会各界更多的人正确认识和总体把握近代汉语。

在大体上弄清楚了近代汉语的历史范围之后，还有个语体范围的问题需要附带说一说。唐代至清代的大量文献，既有用口语写作的，也有用文言写作的，当然也有混用两种语体的。它们是否都能代表近代汉语呢？蒋绍愚在《近代汉语研究概况》（1994）中曾给近代汉语下过如下定义：“近代汉语是从唐初到清初人们在口语和反映口语的书面语中使用的汉语。”（着

重号为引者所加)对于近代汉语阶段存在于部分文献里的文言文 袁宾在《近代汉语概论》(1992)里作了如下评说:

这种语言一般只使用于上层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书面交际中,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它的使用范围是有限的。这个时期的文言文缺乏语言的时代特色,从中很少看到实际语言发展、演变的真正情况。尽管由于种种政治、思想文化上的原因,它一直被使用到二十世纪初,但它并不是现代汉语的直接来源。随着历史的进展,这种文言文的作者,有时会有意无意地接受现实口语的影响,在文言文里夹杂少量的口语成份(这些口语成份自然是近代汉语的研究材料),但没有改变这种书面语言的性质。从汉语史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的文言文是古代汉语在书面上的延续,并不是近代汉语。

第二章

近代汉语的研究价值

关于近代汉语的研究价值，袁宾《近代汉语概论》（1992）、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1994）、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1997）各书的“绪论”部分，都作了比较集中的论说。现综述如下。

一、近代汉语是汉语发展史上一个独立的重要阶段，拥有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学术内容

近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发展演变而来的。与古代汉语相比，近代汉语不但在词汇、语法、语音等各个方面都有自己明显的特点，而且是更为进步、更为发达的语言。新词新义的大量出现，双音、多音词语的比例大大提高，多种新句型的频繁使用等等，使汉语反映概念更加精确，表达思想有了更多的形式。这只要举个简单的例子便可以说明。《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长篇巨著之所以产生于明清时代，固然是文学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应该是语言发展的结果。很难想象，若使用古代的文言，能如此流畅无碍、舒卷从容地描绘出广阔而又细腻逼真的社会图景，刻画出各个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的众多人物形象。这样的任务是由近代汉语完成的。

近代汉语的时间跨度有一千余年，口语文献浩如烟海，反

映方言的材料也很多，具有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和学术课题。

二、研究近代汉语是研究汉语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对于深入研究现代汉语也有重要作用

近代汉语位于古代（上古和中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这种特殊的位置使得近代汉语在汉语史的研究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汉语几千年的发展未曾出现重大的断裂，是一个自古以来连贯的过程。探索汉语发展的来龙去脉，寻求其演进、变化的种种规律，是汉语史研究中最引人入胜、也最有价值的课题。而这种纵向研究的许多问题都必须经过近代汉语阶段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

例如《切韵》音系如何演变为现代音？现代北京话没有入声和 -m 韵尾，声母没有浊音，是如何演变来的？er 化音是什么时候产生的？j、q、x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20 世纪许多学者对《中原音韵》等文献进行了深入研究，才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上述问题。要正确解释现代北京音和现代方言音的演变过程，就必须对近代汉语语音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再如汉语的被动句，最早是“为”字句，“见”字句，稍后出现了“被”字句，这个过程比较清楚，因为这一变化主要发生在先秦两汉时期，人们研究得比较多。到了现代汉语中，“被”字句依然在使用，但在口语中用得最多的却不是“被”字句，而是用“叫”“让”“给”表示被动。这种用法格式是怎样发展来的？还有《水浒》等小说中常见到的用“吃”表示被动，又是怎样产生，怎样消失的？如果离开了近代汉语的研究，这些问题就无法回答，因而汉语被动句的发展历史也就无法完整地、清晰地描写出来。

汉语研究的重点是现代汉语。现代汉语是由近代汉语发展而来的。不研究近代汉语，现代汉语中的一些问题就说不清楚，或者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比如，现代汉语北方话中有“我们”（排除式）和“咱们”（包括式）的区别，而南方一些方言中都说成“我们”，这种差别是怎样来的？现代汉语的副词“难道”、连词“除非”，人人都会用，但这两个词是怎样形成的？这些问题都必须联系近代汉语才能解决。当前现代汉语的研究有一种良好的趋势：把现代汉语的研究与近代汉语的研究结合起来。朱德熙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倡导者。他的论文《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1985）指出汉语方言中的反复问句有“VP不VP”和“可VP”两种类型，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就追溯了这两种反复问句的历史，对近代汉语中反复问句的状况作了调查和分析。这样就更充分地说明了现代汉语中这两种反复问句的来源以及他们具有的类型学意义。这篇文章不仅在结论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对我们都是很有启发的。

在编写本章的时候，我们还琢磨过下列两项学术事件所包含的意义。

1. 随着学界对近代汉语的上下年限有了逐渐明确的认识，并在此学科内迅速获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有一批学者又将眼光转移到近代汉语上限之前，大抵是东汉晚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口语现象。该时期含有口语成分的文献，如笔记小说、乐府民歌、汉译佛经等在近十年来受到比以前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多数学者将该时期的汉语称作中古汉语。目前对中古汉语的研究起势颇盛，方兴未艾。可以预期，这将是21世纪初的热门学科，必将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是与近代汉语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一门学科，它的迅速崛起似与近代汉语研究的兴盛有

一定的关联。

2.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开创者吕叔湘多年深入研究近代汉语，在他的晚年提出了对汉语史分期的意见：汉语史首先应是古代与近代二分，至于现代汉语，只是近代汉语中的一个部分。此意见堪称尖新，引起不少学者的兴趣，有给予支持的，也有提不同意见的。总之，学者们由此而对汉语史的分期及其标准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观察与思考。这个新的意见对我们全面把握汉语文献语言的发展进程，进而对汉语史准确分期的工作富有启迪意义。

上举两项，加上本章前文所述，似可表明，近代汉语研究领域的开拓掘进，对于影响、带动相关学科乃至整个汉语史研究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三、研究近代汉语可以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阅读理解该时期各类口语文献，对于提高文献整理工作的质量也必不可少

蒋绍愚在他的著作中选录了近代汉语文献中三个片断，分别出自敦煌民间文学作品《燕子赋》、宋代哲学家朱熹的《朱子语类》和元代的会话课本《老乞大》，并指出，这些篇章都比较接近口语，在当时应该都是很好懂的。但今天我们读起来却会感到困难，这就是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差距。要真正读懂这些作品，就要研究近代汉语的语法和词汇，弄清楚近代汉语的面貌。

蒋冀骋、吴福祥在他们的著作中，举出实例说明，整理用近代汉语写的历史、哲学、文学等作品，只有熟知近代汉语，才有可能少出错误，做到精审准确。如中华书局本《五灯会元》（1984）卷四《黄檗希运禅师》：“长老身材没量，大笠子

大小生。”其中“大”字应属上句，“没量大”系当时口语，点校者不明，错误地将其割裂了。

诸如此类的误例，在点校本《五灯会元》和其他各类近代汉语文献的点校本中，实在是不少的。由此可见研究近代汉语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其他学者，如严学窘为《近代汉语研究》（胡竹安等主编，1992）写的弁言，蒋维崧为《近代汉语词典》（高文达主编，1992）写的序中，也都对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意义作过简要精当的论说。

第三章

近代汉语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撰著的《近代汉语虚词研究》(1992)在绪论部分安排了一篇《建国以来近代汉语研究综述》的文章,比较全面系统地、也较客观地叙述了近代汉语的研究史。该文视野并不局限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此前的情况也作了回顾。读者可从中看清近代汉语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这篇文章分引言、文献、语音、词汇、语法 5 个部分。下面逐一介绍。

该文引言部分写道,传统语言学受其研究目的和方法的局限,很少涉及近代汉语。从 20 世纪 40 年代起,一些前辈语言学家开始使用科学的方法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在当时,无论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语言学家,还是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为数不多。新中国成立以后,近代汉语研究工作逐渐开展起来,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著作和论文。近十余年,近代汉语研究工作有了较快的发展,已经开始形成了一支较稳固的研究队伍,每年都有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出现。并先后在武汉华中工学院(1984)、上海教育学院(1986)、深圳大学(1988)举行了 3 次近代汉语研讨会(引者按,此研讨会每两年 1 次,至今已举行了 9 次)。经过 40 年的努力,近代汉语研究的局面已经打开,对一些基本问题经过讨论逐渐取得了趋于一致的认识,资料整理和普及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词

汇、语法研究工作已经广泛地开展起来，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一定特色的研究方法。

该文文献部分写道，1985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刘坚编著的《近代汉语读本》，该书展示了丰富多彩的近代汉语研究资料，为初学者全面认识近代汉语的面貌，提供了视野开阔的读本。此外，刘坚《古代白话文献简述》（1981）、梅祖麟《敦煌变文里的“熠没”和“𠄎（举）”字》（1983）、刘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的白话资料》（1985）、江蓝生《皇明诏令里的白话敕令》（1988）等文章也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大量近代汉语文献，包括一些过去较少为人所知的材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部分同志合作编集的《近代汉语语法史资料汇编》3卷已经完稿（引者按，该书已于1990—1995年出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利用显微胶片对校敦煌变文的工作也在进行中（引者按，该校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已于1997年出版）。

该文语音部分写道，近代汉语语音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在这之前，钱玄同《文字学音篇》（1918）首次提出元明清代所谓“北音时期”的语音为语音史的一个发展阶段，并指出《中原音韵》等韵书在语音上的文献价值。30年代有白涤州《北音入声演变考》（1931）、罗常培《中原音韵声类考》（1932）、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1936）等论著问世。王力《中国音韵学》（1936）辟有专节介绍《中原音韵》。40年代，陆志韦撰《释中原音韵》等论文9篇（1946—1948）。50年代，王力《汉语史稿》（上册）把《中原音韵》音系作为近代汉语语音的代表——汉语语音史的一个新的重要发展阶段加以论述。随后有杨耐思《周德清的〈中原音韵〉》（1957），对

《中原音韵》及其音系的性质和它的重要性作了概括的介绍和评价。60年代上半期，赵遐秋、曾庆瑞、李新魁、忌浮等一些学者就《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和“入派三声”的性质问题展开了一次讨论。80年代上半期出现了3部研究《中原音韵》的著作：

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1981）

李新魁《中原音韵音系研究》（1983）

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1985）

这三部著作的问世，以及大致同时发表的一批论文，将《中原音韵》的研究推向了高潮。这批论著无论在深度、广度，还是在材料的挖掘、研究方法上都有新的突破。

70年代末和80年代，语音学界还对与《中原音韵》同类的另一部重要韵书《中原雅音》进行了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与此同时，许多学者还对元代前后的各类语音问题做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涌现出大量的论文和一批专著，取得了空前丰硕的成果。

该文词汇部分写道，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在近代汉语研究中是开展较早、收获较丰的。从明清开始，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做过一些汇集资料、证古寻源的工作。20世纪20年代以后，出现了胡朴安《俗语典》（1922）、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1948）、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1956）3部俗语词专著。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出版了一批专著，数量之多，质量之高，皆远胜于此前。较为重要的专著有：

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1953）

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1981，第四版。引者按，